

新 / 闻 / 传 / 播 / 学 / 丛 / 书

——· 第二辑 ·——

环境风险的媒介建构与 受众风险感知

王 庆 / 著

中国传媒



环境风险的媒介建构与 受众风险感知

王 庆 /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风险的媒介建构与受众风险感知 / 王庆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57-1871-7

I. ①环… II. ①王…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8186 号

环境风险的媒介建构与受众风险感知

HUANJING FENGXIAN DE MEIJIE JIANGOU YU SHOUZHONG FENGXIAN GANZHI

作 者 王 庆

策划编辑 欣 雯

责任编辑 李 明

特约编辑 杨云飞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871-7/G·1871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MULU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1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5

第三节 主要内容和章节安排 / 7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9

第一节 环境风险 / 9

第二节 媒介建构环境风险的社会脉络 / 17

第三节 两种环境风险议题的媒介建构 / 28

第四节 主流媒体建构环境风险的策略——归因框架 / 35

第五节 社会化媒体建构环境风险的策略——情绪框架 / 43

第六节 风险感知 / 51

第七节 大众媒介与风险感知 / 64

第八节 情绪与风险感知 / 74

第三章 主流媒体雾霾风险建构的框架分析 / 82

第一节 现实背景 / 82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84

第三节 统计结果与分析 / 88

第四节 结论和讨论 / 115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121

第四章 社会化媒体雾霾建构的情绪框架分析 / 126

第一节 研究目的 / 126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127

第三节 统计结果与分析 / 132

第四节 结论和讨论 / 144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147

第五章 大众媒介雾霾风险建构的效果 / 150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151

第二节 研究模型与假设 / 152

第三节 数据分析 / 158

第四节 讨论与结论 / 177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181

第六章 结 语 / 184

致 谢 / 190

参考文献 / 192

附 录 / 219

附录 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19

附录 2 两报雾霾报道编码表 / 220

附录 3 两报雾霾报道编码说明 / 222

附录 4 @人民日报雾霾微博编码表 / 223

附录 5 @人民日报雾霾微博编码说明 / 224

附录 6 雾霾环境风险感知调查问卷 / 226

第一章 绪论

对于像我这样为数不多的人来说,比起看电视更令我兴奋的是看到大雁从天空飞过。就像我们能自由地谈话那样,我们应该拥有随时都能看到白头翁花的权利,这是我们与生俱来不应被剥夺的权利。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贝克在阐述风险社会理论时指出,当代社会面临着各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威胁,人们正置身于一个遍布风险和危机的社会之中,贝克谓之“文明的火山”。在来势汹汹的风险社会面前,我们忽然惊觉人类过去很多“随时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如今正在变得不再理所当然。蓝天、白云、洁净的水,混合着草香和花香的空气,正在逐渐变成一去不回的记忆抑或遥不可及的奢念;人类陷入了现代性带来的生存焦虑中。

现代风险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谁都难以独善其身。这些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

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安东尼·吉登斯,2000)并不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专有,它不仅遍布全球,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穷人更不留情。“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情形变得更为复杂,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也更为严峻”(庄友刚、张国华,2009)。

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各种风险积聚成为当前社会形态的一种典型特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压缩的现代化”的特殊国情使我们不得不面临更为复杂的简单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的双重境域。

环境问题可以说是目前我国社会最为突出的风险议题。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最受公众关注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状况依然令人忧虑。”^①无疑,这些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环境问题的凸显,提高了公众对我国整体环境风险的感知。近年来,由环境风险导致的群体事件、社会抗争此起彼伏,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公众在高风险社会中的典型心理表征和情绪的反映。

2 环境风险从成因上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自然环境风险,也叫原生环境问题,指像地震、海啸、飓风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这些事件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程度;而人为环境风险或次生环境问题,也就是吉登斯所称的“人化”风险,是由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危害或者通过环境又将危害返回给人类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纵观我国社会目前面临的这些环境风险不难发现,人为环境风险已超过自然环境风险成为环境风险的主导内容(史明萍,2011)。人为环境风险深刻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人们在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大对环境的剥削和破坏,使得社会与环境的对立日益加剧,最后不得不反过来承受环境的报复。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中所指的风险概念区别于传统风险的典型特征是全球性后果和现代起因。“今天的风险和危险,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它们的威胁的全球性(人类、动物与植物)以及它们的现代起因,与中世纪表面上类似的东西有本质的区别”(贝克,200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也已经进入“风

^① 中国环境保护部:《2013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险社会”的时代。

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研究中的主导性理论范式,社会建构论在认可环境风险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指出环境风险是“社会建构的”这一富有洞见和号召力的观点。正如科拉克和绍特等人所说的那样,社会建构论的主张并不意味着“损害不存在”(Clarke & Short,1993)。也就是说,环境社会学家的目的不是评价环境问题的真实与否,他们想要表达的是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且环境风险评估是一个诸多社会性变量参与的建构过程。

因此,社会学的任务和研究旨趣就是要去解释社会行动者如何创造以及确定什么是危险,即环境风险的社会建构问题。这就使对风险的理解顺理成章地与之所处的社会结构背景和文化脉络勾连起来。建构主义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一再提醒人们注意有关风险观点形成和传播的政治、制度以及组织的情境。

从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来看,我们不仅处在“风险社会”,而且还处于信息化和媒介化的社会。大众媒介在环境风险社会建构中的角色既是各方利益攸关者的风险话语呈现者和竞争的舞台,同时它本身也作为行动者之一,参与对风险社会定义的塑造和权力的争夺。正如建构主义所指出的那样:风险是一种依赖于传承的知识而建构起来的认知结果。“充斥于风险社会中的各种威胁的物质性、非物质性以及可见性、不可见性意味着所有关于它的知识都是媒介性的,都依赖于解释”(芭芭拉·亚当等,2005)。由此可见,在这种依托于知识对风险的解释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中,大众媒介无疑是关键性角色,“对风险的媒介化非同小可——被用来理解风险的媒体会提供风险的感受并因此而卷入对风险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芭芭拉·亚当等,2005)。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风险到底是如何被媒介化的?换句话说,大众媒介究竟是如何建构风险的?它采用了哪些策略来建构风险?媒介对环境风险建构的社会动因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现阶段相关研究多以理论阐释的方式从应然的角度给予回答,即媒介应当如何建构风险。此外,也有部分实证研究通过对媒介内容层面的分析予以回应。这些研究使我们大致了解到,在建构环境风险方面,媒体通常采用的策略是议程设置、框架、话语和修辞等。但这又使我们产生新的

好奇和疑问——媒介建构风险的现实效果又如何呢？也就是当媒体在特殊的动机下以特定的方式论述风险时，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受众？

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理论以及风险感知理论等早已都对媒介风险传播的效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媒体的大量报道，不仅告知事实，而且形塑议题，还能引发民众恐惧的感受(Kasperson, R. E. et al, 1988)；媒介呈现和风险感知存在因果关系。媒介不仅决定了风险以何种面貌呈现于世，更影响着整个社会对风险的感知。遗憾的是，与这些理论相呼应的实证研究暂付阙如，尤其是在国内风险研究领域，对媒介风险传播的效果研究十分缺乏，而把风险议题的媒介内容和效果结合起来考察的实证研究更是处于空白状态。不仅如此，从风险应对和管理的实践层面来看，我国所处的历史转型时期是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汇聚、交融、叠加的社会形态。这种现代性既加强了风险的产生，又未给风险制度设计和管理留下时间。因此，在已经全面媒介化的风险社会，如何有效地借助和吸收大众媒体作为应对共同风险问题的整合性资源，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寻找本土化的解决之道。

4

基于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本研究试图以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为线索，对我国传媒环境风险传播在内容和效果方面进行比较深入、完整的探查，探究在我国这样一个高度媒介化的复合型风险社会语境下，大众媒介的风险传播现状到底如何，它在社会的风险定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评价它，媒介建构是否影响或如何影响受众的风险感知，大众媒介怎样才能成为社会最有效的风险决策的孵化器。研究之所以将媒介内容和效果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其原因主要是：受众调查和统计分析能够检验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实际效力如何，而对媒体内容的具体分析则有助于诊断出目前我国大众媒介的环境风险沟通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或许能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认识，并对我国媒体风险建构的现实表现有所反思。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本文选择雾霾这一具体环境风险作为媒介框架及其效果研究的切入点。尽管雾霾只是我国面临的众多环境风险的冰山一角,但它极具代表性,是我国当前整体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也是近年来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高度聚合的一个热点问题。

传播学领域的“框架”是一个多功能、多维度的概念。多功能是指框架分析既是理论,又是方法。多维度是说框架概念主要得益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领域的滋养,因此在内涵上有所差别。社会学取向大多将框架作为影响个体诠释事件意义的一套观念系统,因此框架的含义更偏重于强调框架作为“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的功能;而心理学研究角度更倾向于强调框架是“心灵的内在结构”。英文文献中一般用“frame”对应社会学意义上的框架,而用“framing”倾向于心理学含义上的框架;不同的内涵所延伸出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也不同。比如,对于前者“frame”,研究者可以通过内容分析或分析话语来理解框架是什么,框架如何被塑造;而对于后者“framing”,主要是用效果研究以了解受众怎样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

本研究实际上是在遵循实证主义研究精神的前提下,以雾霾风险传播为考察对象进行的一项整合性的框架研究。整合性体现在它比较完整地结合了传播学框架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既包含了针对内容部分的媒介框架分析,又包含了针对效果部分的受众框架分析。

Dietram A. Scheufele(1993)把框架研究按照变量性质分为两类,即分别把框架视为因变量和自变量。潘忠党(2006)将新闻框架分析划分为话语(文本为再现的体系)、话语的建构(框架建构的行动及过程)、话语的接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本文也正是从逻辑上将媒介框架依次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来进行考察,主要涉及环境信息的媒介文本框架建构和媒介的接收框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希望借此完整地说明环境风险议题中媒介框架建构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具体到文章主体中则形成两个前后照应的部分。前一部分为媒介内容、话语分析,分别对我国当下媒介系统的主流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雾霾风险建构进行由表及里的剖析。对于主流媒体,我们选取《光明日报》和《新京报》,对这两份报纸一段时间以来建构雾霾风险的框架策略和归因话语进行描述,并探究媒介框架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深层权力动机。而对于社会化媒体,我们拟以“@人民日报”的相关雾霾微博评论为例,对其进行主体、议题和情绪(框架)等分析。回溯国内已有的风险传播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情绪是一个极具价值但又尚待开发的领域。尤其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媒体,其天然带有“重情绪、轻信息”的传播特征(焦德武,2014)。根据 Izard(1980)、Nabi(2003)等学者的观点,情绪也可以被视为影响受众感知的一种框架,但情绪框架有别于认知框架,因而对社会化媒体情绪框架的探讨是对传统意义的媒介信息框架的一种补充和创新。后一部分为媒介效果研究。该部分作为对前一部分考察内容建构的呼应,力图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并进行假设检验:媒介建构是否真的具有说服效果?如果有,受众对于特定环境风险的情绪感知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因素?而这一影响机制和路径又是怎样的?

此外,前一部分采取的媒介社会学理论视角为后一部分的感知研究提供了宏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的线索,一定程度上是对感知测量偏重于微观个体层面的传统不足的弥补;而反过来,环境风险感知的受众调查结果又对大众媒介建构环境风险的总体框架效应(果)给予了验证和反馈,避免对媒介风险建构的评判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想象层面。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传播学角度把环境风险议题划分为常态型和冲突型两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不同环境风险议题所处的社会秩序、社会风险情绪反应等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对环境风险的建构策略和方式。我们认为,只有在加入了这些参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把不同媒介场域对环境风险的建构纳入宏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脉络中去。第二,提出情绪框架是社会化媒体建构风险的独特路径和策略,对这一新概念的生成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推演,并作为分析工具应用于主体实证研究部分。第三,根据归因情绪理论,大胆提出了媒介风险归因框架不仅是媒介建构风险的典型策略和方

式,而且公众对媒介这一建构策略的采纳和接受情况会引发他们不同的风险情绪,并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我们通过对这几个关键概念和相关研究的梳理,初步建立了媒介—情绪—风险感知三者关系的研究构想和模型,随后在研究中对其进行检验。

第三节 主要内容和章节安排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设计,本书各章节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交代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并概述研究的大体思路和方法。

第二章是理论背景和研究现状,分别对环境风险、媒介归因框架、情绪框架和风险感知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媒介建构环境风险的社会脉络及其建构策略以及大众媒介、情绪和环境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作为其后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章中,研究者并不囿于对已有文献的机械整理和概括,而是根据研究所需,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提出了新的环境风险议题划分标准、媒介情绪框架概念、媒介风险归因框架概念等,并对它们的合理性进行了逻辑推演和论证。

第三、四、五章是作为主体的实证研究部分,包括两大部分:

第三章和第四章为主体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内容是主流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对雾霾风险的建构。主流媒体方面,侧重于分析其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建构雾霾风险的议题框架和归因归责框架,并在媒介社会学的理论视域中探讨这两种主要框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话语权力。社会化媒体方面,对社会化媒体的考察以主流媒体为参照,着重分析社会化媒体所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对雾霾风险的建构。相对于主流媒体,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舆情组成中天然携带了更多的情绪特征,因此,这方面研究将重点分析微博的雾霾风险情绪,并提出情绪框架是社会化媒体风险建构的动力机制,个体的风险情绪经由情绪框架与深层社会

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发生激荡才演变为社会风险情绪。情绪的框架机制为我们分析受众情绪表征背后的权力生产和流动提供了契机。

第五章是主体研究的第二部分,作为对前一部分研究的呼应,试图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媒介、风险情绪与风险感知三者关系的定量考察,对媒介建构风险的现实效果予以检验。根据认知—情绪—感知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我们假设媒介风险信息的内容和传递方式不仅能从认知的路径对人们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也能间接地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情绪来影响其风险感知。

第六章为结语部分,对全部研究结果和观点进行提炼、升华,并尝试对我国大众传媒的环境风险传播理念与实践提出适切的建议。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第一节 环境风险

9

一、环境风险的认识论之辩

社会学者总是从认识论的原点出发来定义社会,对风险的界定也是如此。从不同的认识论范畴下观照“风险”这个概念,其内涵和认定标准迥然不同。迄今为止,西方各种有关风险理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也就是把“风险”这一社会事实当成纯粹的“物质之物”还是一种主观构造之物来看待。

实在论坚持把风险视为一种不依赖于认识的客观实在。因此,风险是能被认知的、可测量的,其结果将以可能性或概率形式被确切表达。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产生的风险观被称为技术范式,强调风险评估是一个技术行为,将专业理性作为行动和解释的准则。风险现实主义者相信,这种主要由科学家或专家从事的风险推算是基于大量事实的记录,其结果接近真实状况。

社会建构论是建立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基础上的一种研究策略。科学知识

社会学认为,一切知识的内容包括科学理论在内,根本上来说都是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而组成的,其基本前提是对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都抱有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相对主义立场。这样一来,就导致建构论在对风险的认识上与实在论格格不入。与实在论把风险视为一种客观事实不同,建构论认为外部实体是主体能动创造的结果,各种风险本身都是经由社会过程而形成的产物,只有被意识到的才是风险。基于这种思考向度,贝克(2002)对现代风险的定义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贝克,2004)因此,对建构主义来说,作为事实的风险并不重要,风险只不过是一种隐喻性的思考方式,一种“有很强的人为色彩的创造物”(斯科特·拉什,2002)。风险的定义取决于人的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贝克(2002)甚至还说,“‘风险’和‘(公众对)风险的定义’完全是一回事”。

英国社会学家派特·斯崔德姆(Strydom, P., 2002)在上述这一有关风险的二元认识论的分歧框架基础上,把当代风险研究的理论划分为四类:强实在论、弱实在论、强建构论和弱建构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及英国社会学家派特·斯崔德姆和邓拉普所持的风险观点,可以被视为弱建构论(或称建构的实在论)。他们否认风险特征的可计算性,认为风险不仅在技术应用过程中被产生,而且在其意义的赋予过程和决策过程中被制造,强调风险的秩序性并倚重制度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的特征是环境退化带来越来越多的矛盾。弱建构论或者说制度主义十分强调环境风险的“人化”特征。在贝克眼中,风险来自于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悖论,环境风险更可能是社会危机而不是自然危机。他将现代风险的范畴限定于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在这一点上,吉登斯和贝克如出一辙,认为“人化”风险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的起点和标志(贝克,2005)。

强建构主义风险理论的代表则主要是玛丽·道格拉斯、斯科特·拉什等的文化理论和卢曼的自我再生系统理论。风险文化学派质疑“风险社会”理论所

论证的风险的“秩序性”问题,并提出要用“风险文化”取代“风险社会”。他们认为风险不是某种秩序,而完全是一种认知结果和文化现象。玛丽·道格拉斯和威斯维尔德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说:“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斯科特·拉什,2002)不仅如此,在不同文化脉络和现实情境中,风险均有不同的话语解释。所有风险意识、风险话语、风险伦理都只是对风险的反思性判断,是对风险文化的自觉建构。卢曼认为风险是“时间限定的形式”,是一种“偶然出现的图示”,而且,这一偶然性来自人的认知。

风险研究的实在论取向批判建构主义的风险观念,指出建构主义是在滥用社会学的理解力,漠视环境危机的现实性。建构主义学者却认为这是现实主义者对自己的一种简化式的误读,声称自己的理论视角并不以否认环境问题及其引发的风险确实存在为前提,而是也承认风险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是建构主义强调的是,自然虽然有着强大的力量,但自然作用的力度和方式深受人类社会建构的影响。所以说,风险建构论的着眼点不在于评价环境风险的真实与否,而在于“解释社会行动者如何创造以及确定什么是危险的界限”(Clarke & Short,1993)。如此一来,建构主义为何将关注焦点从客观具体的风险现实转向风险感知、心理和文化制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学领域的风险建构论和心理学领域的风险感知研究流派都强调风险的主观性,但二者之间也有研究目标和前提的不同。社会建构论者的视域更为宏观,他们强调环境风险评估是一个社会性变量参与的建构过程,其中,社会背景和团体而不是个人的认知在选择风险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其分析对象主要是风险中的群体和社会结构、文化制度背景。他们的研究问题多半是谁来建构风险,接受风险的标准是怎样界定的,“风险社会”定义的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一些群体、组织和机构有更大的能力去影响风险评估和管理实践,等等。而起源于心理学的风险感知研究者却更为关心有关个体层面的各种相关变量,即人的性格、价值观念、认知、情绪等是如何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行为倾向的。